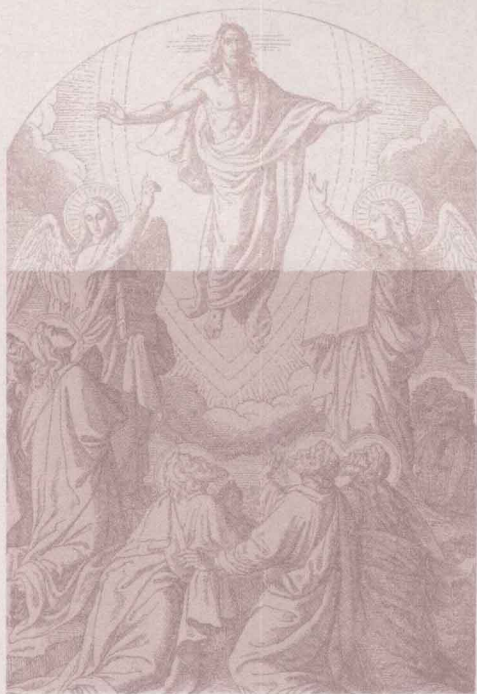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J.C. R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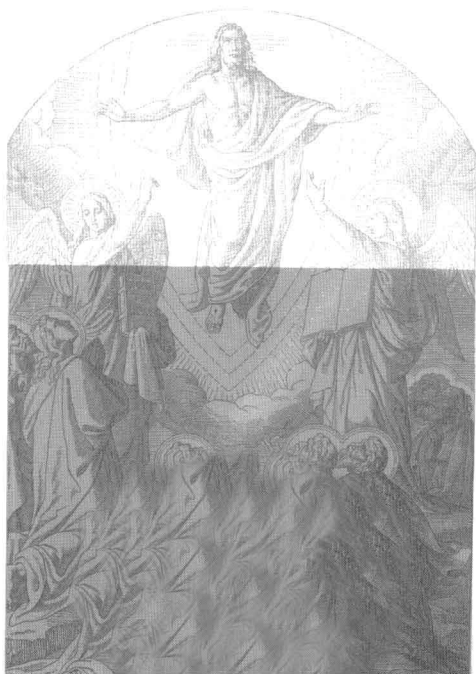
Holiness

圣洁

【英】J.C.莱尔 著 李漫波 朱保平 译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全 治

【英】J.C.莱尔 著 李漫波 朱保平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3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根据 J.C. Ryle, Holiness, Evangelical Press, 1979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洁 / (英) 莱尔著; 李漫波, 朱保平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0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4551-5

I. ①圣… II. ①莱… ②李… ③朱… III. ①基督教
—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4069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刘 峣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8.75

字 数 365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46.00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

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 and 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度，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译本导言

赵刚

著名神学家巴刻 (J. I. packer) 在他的《活在圣灵中》(*Keep in Steps with the Spirit*, rev., 2005), 谈到他年轻时曾经历了一场灵命危机, 因为他受到了某种错误的灵性观影响。后来帮助他走出危机的几部书是, 约翰·欧文 (John Owen) 关于圣灵和成圣的著作, 另一部就是莱尔的《圣洁》。后来巴刻特意写作了一部关于莱尔的书, 名为《忠心和圣洁: 莱尔的见证》(*Faithfulness and Holiness: The Witness of J. C. Ryle*, Crossway Book, 2002)。书中前半部分是巴刻写的莱尔小传, 后半部分就是莱尔《圣洁》的第一版, 内容包括我们现在手中这部书的前七章。因此我相信, 译介出版莱尔的《圣洁》中文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能帮助很多在成圣道路上挣扎的基督徒。

一 莱尔的生平

莱尔 (J. C. Ryle, 1816—1900) ①生于英格兰柴郡 (Cheshire) 的麦

① 关于莱尔的传记, 除了文中提到巴刻的著作之外, 还有 Eric Russell, *J. C. Ryle: That Man of Granite*, Christian Focus, 2008, 以及 Ian D. Farley, *J. C. Ryle: First Bishop of Liverpool*, Paternoster, 2001. Peter Toon & Michael Smout, *J. C. Ryle: Evangelical Bishop*, Reiner Publications, 1976. 另外, 在 http://www.churchsociety.org/issues_new/history/ryle/iss_history_ryle_intro.asp 上, 能看到 M. Guthrie Clark 所著的 *J. C. Ryle Biography*, 由 Church Book Room Press 出版。约翰·派博 (John Piper) 对莱尔的生平的简述, 见 <http://www.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biographies/the-frank-and-manly-mr-ryle-the-value-of-a-masculine-ministry>, 最后还有莱尔本人的自传, *A Self-Portrait: A Partial Autobiography*, 1975 年经 Peter Toon 编辑后, 由 Reiner Publications 再版。

克尔斯菲尔德 (Macclesfield) 市。就大的时代背景而言, 在他出生的前一年, 拿破仑在滑铁卢被英国威灵顿公爵所领导的联军击败, 这巩固了英国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而英国的工业革命 (1770—1850) 更是使她独领风骚, 在随后的维多利亚时代 (1837—1901), 成为大英帝国当之无愧的黄金时期。

就英国的政教关系而言, 确保圣公会人士在民事政府中特殊地位的《测试法案》(Test Act) 在 1828 年被废除。因此, 后来作为圣公会在利物浦第一任主教的莱尔, 显然对圣公会在这段时期的兴衰有切身体会, 而他的儿子赫伯特 (Herbert E. Ryle, 1856—1925) 后来也被任命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牧长 (Dean of Westminster)。

就教会内部的历史变迁而言, 当时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的自由主义神学虽然在欧洲已经有相当的影响, 但在英国还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才开始产生冲击。事实上, 1855 年至 1865 年被认为是福音派在英国圣公会里的一段鼎盛时期。这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英美的第二次大复兴的尾声。英国第二次大复兴可以说是约翰·卫斯理的第一次大复兴的延续, 只是卫斯理的复兴后来脱离了英国的国家教会, 即圣公会, 但复兴运动本身在圣公会里也产生了很多影响。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福音派的克拉朋联盟 (Clapham Sect), 其主要人物有维恩家族 (Henry & John Venn) 和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 此外, 在圣公会里还有一波亲天主教会的复兴运动, 史称牛津运动, 主要人物是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 等人。不过, 牛津运动所衍生的礼仪运动 (Ritualist Movement) 后来是莱尔服侍早期的主要辩论对象。莱尔的后期服侍, 更多地关注教会内的治理事务和传福音宣教, 对自由主义神学涉及不多。从福音派复兴的角度而言, 与莱尔同时代的人包括慕迪 (1837—1899) 和司布真 (1834—1892)。

对英美教会而言, 老福音派的根源至少要追溯到卫斯理的第一次大复兴。事实上, 莱尔的曾祖母就是被卫斯理带领信主的。这也导致莱尔

家族几代人虽然并没有离开圣公会，却都是复兴运动的支持者。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莱尔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市长。到莱尔的父亲时，虽然整个家庭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复兴运动和福音派，但因为他当时在经营一家银行，这在后来写回忆录的莱尔眼中，父亲整天都忙于世界上的事，很少回家、更没有什么敬虔操练，根本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这按现在一些人的标准可能有点说得太过，但莱尔就是这样认为的。话说到最后，谁是真基督徒，只有上帝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别；但这倒可以让我们略见一斑莱尔“花岗岩”般的性格。

莱尔出生于英国鼎盛时期的中上层家庭。1828年他11岁时，被送到著名的伊顿公学，一直待到1834年进入了牛津。虽然莱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两个学校的评价都不高，但现在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它们对莱尔一生的“积极贡献”还是不小。比如，莱尔在伊顿完全掌握了圣公会的信仰宣告，即《三十九条信纲》的教义框架，到死他都没有偏离。此外，在伊顿的板球队担任队长的经历，他的领袖才能得到了培养，以至于后来同时代的人称他是“天生的领袖”。他在伊顿精英辩论队里的经历，显然锻炼了他的口才，使他后来成为出色的传道人，这也是一个贡献。当然牛津给他提供了坚实的学识训练，虽然在很多自由“进步”的人士看来，牛津当时的课程显得有点保守。此外，莱尔的重生经历也发生在牛津，虽然在这之前他的“挂名”基督徒仅阅读包括《要理问答》和《天路历程》——这或许会让很多至今仍没有读过这两本书的“真正”基督徒汗颜吧！

他的“重生”经历基本上是这样的。1837年上半年，到牛津仅仅两年多之后，莱尔就着手准备包括五天笔试和一天口试的毕业考试，虽然最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但身体垮掉了。这场病导致他开始认真阅读圣经，思考关于悔改的事，并且祷告。因此，莱尔认为是敬虔操练带领他走过了毕业考试的煎熬。然后是他在1837年底的经历。在一次聚会上，他听到读经者宣读《以弗所书》2:8，感到是圣灵在亲自对他的心说话，

于是被上帝的福音恩典完全抓住了。此后他阅读了威伯福斯的《对基督教的实际看法》(*Practical View of Christianity*) 等书，从而完全建立了福音性的基督教信仰。

但这时的莱尔并没有考虑教牧服侍，虽然与他并列第一毕业的亚瑟·斯坦利 (Arthur Stanley) 很快就受了圣职，最后还成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牧长。有意思的是，后来斯坦利成为自由派的鼓吹者，而莱尔却成为福音派的旗手。不过，当时莱尔想的只是继承他父亲的银行事业，因此开始攻读法律。但 1841 年他父亲的银行意外破产，全家人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债务一直到 20 年后才还清。虽然在事后的回忆中，他仍然感谢上帝主权的带领，相信上帝所指引的道路一定是最好的。但这个创痛伴随了莱尔一生。事实上，莱尔后来回忆说，若不是他当时已经在福音性的基督教信仰上得到建立，很可能就自杀了。

所以，1841 年莱尔接受圣职的邀请，可以说纯粹是出于谋生的考虑。而且他后来的几次迁职也很难排除有经济上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否定莱尔的圣职呼召，大概也失之偏颇。因为对相信上帝主权预定的莱尔来说，包括谋生考虑在内的环境，都是上帝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恰当手段。因此他的服侍从一开始就尽心竭力，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上帝的选择永远都不会错。

最初莱尔在艾克斯伯里 (Exbury) 的乡下服侍了两年，然后转到温彻斯特的圣托马斯城。虽然在温彻斯特的服侍开局不错，当地教会也极力挽留，但萨福克郡 (Suffolk) 海明翰市 (Helmingham) 薪水的诱惑还是令他难以抵挡，所以几个月后他去了海明翰。不过，莱尔后来承认，他至死都不确定，1844 年从温彻斯特搬到海明翰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他在海明翰开始大量接触并进而认真研读清教徒的作品，也开始了后来享有盛誉的小册子文章写作，最后，他在海明翰结了婚，因为当时的薪水够他养一个家了。他在海明翰一共服侍了 17 年，到 1861 年离开海明翰，搬到同一个郡的斯特拉德布鲁克市 (Stradbroke) 时，他已经是全国闻名

的人物了。

事实上，莱尔的主要作品都写于在萨福克郡服侍期间，但到1880年他打算退休的时候，却突然被女王传唤，到利物浦任第一任主教。利物浦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到19世纪50年代，它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贸易额占了整个英国的一半，是伦敦的两倍。据称当时全世界每十艘船就有一艘来自利物浦。但一直到1880年之前，利物浦的教会都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区，反而下辖在彻斯特（Chester）。因此利物浦成立独立教区的呼声已久。从某个角度而言，莱尔的任命是福音派与自由派角逐的一个结果，所以莱尔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任命。他在利物浦的日子里并非没有矛盾，但莱尔的回应是，埋头传福音。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 莱尔的主要作品

“小册子文章”（Tract）写作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源远流长，有人甚至把它追溯到新约时期的书信写作。在近现代教会史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它由一群在牛津的基督徒撰写关于福音和复兴的小册子文章而起，因此，牛津运动有时又被称作“小册子文章运动”。它的篇幅一般就是一篇讲道的内容，但印成单行本发行，便于携带，售价低廉，是传播的好工具。莱尔在牛津时期，恰逢牛津运动，所以对这种方式很熟悉。事实上，莱尔后来的众多美誉之一就是“小册子文章王子”（Prince of Tract-Writer）^①。

莱尔在艾克斯伯里服侍时，就以小册子为工具了。他每个月都要把教会的所有家庭进行一次探访，此时就带着包含福音信息的小册子传发，只不过这些小册子里的文章还不是他写的而已。他搬到海明翰之

^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Alan Munden 在 Churchman 杂志上的文章，“J. C. Ryle——‘The Prince of Tract-Writer’”，(2005)。

后，讲道风格渐趋成熟，于是开始了他的小册子文章写作。他的第一篇小册子文章其实就是到海明翰之后讲道的总结，因一场灾难而作。随后他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写作了很多小册子文章，最后集结出版，就是著名的《福音书释经默想》(*Expository Thoughts on the Gospels*)。这一系列作品的写作是为个人灵修和家庭敬拜使用，因此篇幅不长，言简意赅，颇受欢迎，有点现在灵修版圣经的味道。1856年，他出版了《〈马太福音〉的默想》，1857年出版《〈马可福音〉的默想》，1858—1859年出版关于《〈路加福音〉的默想》(上下两卷)。不过他越写越多，特别是注释部分，到了1873年出版《〈约翰福音〉释经默想》时，虽然灵修或讲道式的默想部分还有，但注释部分多得已经很像一本完整的注释书了。

莱尔更著名的是一些独立主题的小册子文章。据统计，截止1897年，他的小册子就已经售出了1200万册，最著名的一些单行本，比如《你圣洁吗?》(*Are You Holy?*)售出了7.5万册，《活着还是死了?》(*Living or Dead?*)售出了11万册，《你祷告吗?》(*Do You Pray?*)售出了13万册，而《我们从宗教改革继承了什么?》(*What Do We Owe to Reformation?*)则一年之内就售出了8万册!因此，莱尔是英语世界中当之无愧的被阅读得最多的作者之一。而且，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至少12种文字，广为流传。

小册子文章写多了，当然就会集结成书。而因为这些书大多是根据小册子文章编辑整理的，因此书中常常会有重复的篇章。有人统计过，莱尔一生（主要是在萨福克的三十几年间）总共创作了二百多篇独立的小册子文章。^①最早的文集是《基要真理》(*Home Truth*)，共八卷，收集了约75篇小册子文章。最著名的文集是他的“三部曲”(或3+1)，即《解开症结》(*Knots Untied*, 1874)、《古旧道路》(*Old Paths*, 1877)、

^① http://www.tracts.ukgo.com/john_charles_ryle.htm 网站收集了莱尔120多篇小册子文章，供有兴趣的人参阅。

《圣洁》(Holiness, 1877) 以及《与神同行》(Practical Religion, 1878)。其中《圣洁》最初是为反驳某种所谓的“圣洁运动”而作, 第一版只有七篇, 1879年再版时, 扩充到了21篇。而《与神同行》是它的姊妹篇, 其内容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

如果要研究莱尔的神学, 这几本书可能是最重要的材料了。^①但有一定神学修养的人只要简单地浏览一遍, 立刻就会发现, 它们不是坊间会看到的系统神学或教义大全之类, 而有很明确的实践导向。诚如约翰·派博所说, 莱尔无论写作还是讲道, 首先是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在做。派博引用巴刻的话说, 莱尔“在阅读时, 头脑里总是伴随着‘这是对的吗’‘这对普通人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些问题。”莱尔作品的特点是, 简单, 直接, 直奔要害, 而且文笔流畅, 读来琅琅上口。莱尔自称他的写作风格是受到约翰·班扬和莎士比亚的影响。他的作品另一特点是, 易读、实践性强但并非浅薄, 钟马田(D. Martyn Lloyd-Jones)在介绍《圣洁》时说, 它虽然具有现代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 但其思想或教义的核心就是对清教徒神学的提炼, 因此钟马田甚至最后都不愿把它与现在温情脉脉的“灵修”作品归为一类。

莱尔在《与神同行》的序言中, 明确把这“三部曲”(或3+1)归结在一起, 期望读者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我们可以说, 前两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教义框架, 而后两部则是具体的实践建议。莱尔的“理论”总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比如《解开症结》, 如果从教义结构的角度看, 其主要关注的是教会论的内容。这是因为莱尔当时的主要辩论对象是“礼仪主义”。所以, 有些内容对现在, 特别是对另外一个文化处境中的我们而言, 可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但另外一些内容, 如关于良心、洗礼、重生、圣餐、教会、信仰宣告、崇拜、安息日, 等等, 则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关于福音的基本真理、救恩的唯一性等内容, 则更是日久弥新, 永不过时。

① 四本书一共收集了80篇文章, 其中48篇在《基要真理》中出现过。

《古旧道路》可以说是救恩论的完整表述，包括罪、称义、赦免、悔改、归信、信心、基督之工、圣灵之工，等等，是任何一个关心自己救恩的人必读或必须掌握的真理。此外，莱尔在这本书的首尾，特意加上了关于圣经的默示、拣选、恒忍（或救恩稳固）三篇，原因不仅是要回应自由主义神学对《圣经》权威的挑战，而且也有对福音派内部在教义上滑坡的担忧。有了这两部书作为基础，莱尔在《圣洁》一书的前七章对成圣神学做了进一步阐述，然后又给出一些具体例子和应用。最后，《与神同行》一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导基督徒的敬虔操练，对每一个切慕敬虔生命的基督徒来说，都具有非常切身的指导意义。

除了这些之外，莱尔至少还有两部有关历史方面的作品值得一提。首先是《英国复兴领袖传》(*Christian Leaders of the Last Century*, 1869)，书中收集了18世纪英国复兴运动中一些著名领袖的传记。该书现在已有中文译本，这是莱尔作品首次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另外一部是《古老的明灯》(*Light from Old Times*, 1890)，较早的版本名为《更正教会的人和事》(*Protestant Facts and Men*, 1882)，但最初名为《那些日子里的主教和执事》(*Bishops and Clergy of Other Days*, 1868)，记载的是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也包括了几位清教徒。

虽然莱尔很多小册子文章是以讲章为基础编撰而来，但也有一些不是。纯粹把他的讲章集结成书的，反而没有几部。事实上一共只有两部。一部名为《楼上之室》(*The Upper Room*, 1888)，莱尔自称此书是从他几十年讲道生涯中精选出的21篇讲道。到1900年，当莱尔打算从利物浦主教的位置上退下来时（两个月后便去世），因为朋友们的极力要求，他又在马登(T. J. Madden)的协助下精选了24篇讲道，即《基督徒的赛程》(*Christian Race and Other Sermons*, 1900)。这两部作品都可以说是莱尔讲道的精华之作，相当值得一读。

莱尔的生活和思想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层面，比如关于教会的合一等。但与此相关的一些作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圣洁》的写作背景

《圣洁》的主要背景是所谓的凯锡克运动 (Keswick Movement) ①。

严格地说,凯锡克运动只是一个推动基督徒生命成长(成圣)的年度大会,在英国西北部一个叫凯锡克的湖区召开,至今仍在举行。所以它的神学观基本上就是该大会讲员的神学观。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刚开始发起时的情形,所以应该说是“早期凯锡克运动”。

在19世纪末,延续卫斯理复兴运动而来的有所谓的“高等生命运动”(Higher Life Movement),凯锡克大会最开始的创办就是承袭了这类运动的精神。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尺度而言,一般人们会把早期凯锡克运动的成圣观追溯到卫斯理的完美主义以及后来一些相关的圣洁运动。但从更细微一点的时间尺度而言,早期凯锡克运动受到了有贵格会(Quakers)背景的一对美国夫妇史密斯夫妇(Robert Pearsall Smith & Hannah Whitall Smith)的影响。他们各自出版了一本书——丈夫罗伯特的书《透过信心的圣洁》(*Holiness through Faith*, 1870),太太哈拿的书《基督徒幸福生活的秘诀》(Hannah Whitall Smith, *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1875),这两本书直接促进了凯锡克大会的召开。哈拿的书后来更被誉为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过根据纳塞利(Naselli)的研究,两人的生

① 巴刻在《活在圣灵中》一书的相关部分(见其第四章),从神学角度对凯锡克运动做了最清楚的梳理,因为妨害青年巴刻属灵生命的灵性观,就是凯锡克运动所倡导的成圣观。不过,纳塞利(Andrew David Naselli)博士给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历史和神学研究。2006年他在Bob Jones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专题*Keswick Theology: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in the Early Keswick Movement, 1875—1920*,其主题就是凯锡克运动。这篇论文现在由Logos出版了电子书,书名为:*Let Go and Let God?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Keswick Theology* (2010)。他的博士论文精简后,在Detroit Baptist Seminary Journal上发表,“Keswick Theology: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in the Early Keswick Movement”,*DBSJ* 13 (2008): 17—67。其他如David Bundy, *Keswick: A Bibliographic Introduction to the Higher Life Movement*,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5); John Pollock, *The Keswick Story: The Authority History of the Keswick Convention*, Moody (1964); Charles F. Harford, *The Keswick Convention: Its Message, Its Method and Its Men*, Marshall Brothers (1907)等等,都比较旧,而且没有太深入的神学分析。